臺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九期
2012 年 12 月　頁 213~246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研究

張　寶　三*

提　要

本論文以清初至乾隆間之刻本及稿、鈔本作爲主要研究對象，兼及部分嘉慶、道光間之鈔本，擬對此時期古籍中所鈐之紙廠印記加以研究。所謂「紙廠印記」乃是紙張製造者在紙張製造完成後所鈐之印記，此與古籍中所鈐之藏書印性質不同。本文將對此時期紙廠印記之內容、形制以及其中較特殊印記形成之原因等加以探討，並進而論述其在版本鑑定及造紙史研究上之價值。全文計分爲以下五節：一、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之內容與形制。二、紙廠印記之確認與考證。三、紙廠印記呈現長條形片段面貌之原因蠡測。四、紙廠印記在版本研究上之價值。五、紙廠印記在造紙史研究上之價值。希冀經由本文之探討，對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之內容、特徵及其在學術研究上之價值，有初步之瞭解。

關鍵詞：清代、善本、紙廠印記、版本鑑定

本文於 101.07.18 收稿，101.11.21 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Stamped in the Rare Chinese Books of the Qing Dynasty

Chang Pao-San*

Abstract

This study researches the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in block-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transcripts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Emperor Qianlong's period (1736-1796) as well as some transcripts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 Jiaqing (1796-1820) and Emperor Daoguang (1821-1851). Different from the book collectors' marks commonly found in ancient Chinese books, the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are stamped at the end of papermaking process. The study analyzes these marks' contents, forms and stories, and evaluates them in terms of edition verification and papermaking history. The following five sections are included: (1) the contents and forms of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in rare Chinese books of the Qing Dynasty, (2) verifications of these marks, (3) the possible reasons why these marks are long, rectangular, and partial, (4) their value in editionology, and (5) their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papermaking. Hopefully, the above exploration will give readers an ini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ir value in academic research.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eywords*: Qing Dynasty, rare books, paper manufacturers' marks, edition verifica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研究

張　寶　三

前　言

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時見鈐有紙廠印記，此類印記乃鈐於古籍被印刷或書寫之前，屬於紙張生產階段之鈐印，[1] 與古籍中所鈐之藏書印性質有別。以往學者專家描述古籍中之鈐印，於此類紙廠印記雖偶有述及，[2] 然尚鮮見專文

1 現代學者專家敘述對造紙工藝之實地調查時，亦每述及紙廠在生產流程末項之鈐印，如張秉倫、方曉陽、樊嘉祿合著之《中國傳統工藝全集・造紙與印刷》（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5 年）一書，第三章第三節「宣紙傳統生產工藝」中記載對涇縣古壩汪同和宣紙廠之調查，其「宣紙成紙工藝流程」之末項云：「11.包裝　每 100 張紙分爲一刀，剪後加蓋規格、品名、印記。用有色包裝紙包起來。」（頁 88）又同書敘述「四川夾江竹紙生產技術工藝調查」時，其生產流程之末項亦云：「22.清點和包裝　紙張乾燥後要理齊分刀，每刀 100 張，用半圓形的切紙刀切去紙垛四周毛邊，然後進行包裝。以兩刀爲一盒，25 刀爲一捆，貼上標簽，蓋上廠印，即可外運出售。」（頁 113）

2 如賴貴三在〈《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經部・易類》考釋（上）〉一文，描述《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中之鈐印時，即嘗述及「『吳正有號』楷書長方陽文戳記」、「『吳正裕號』楷書長方陽文戳記」等二印，見《中國學術年刊》第 24 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印行，2003 年 6 月），頁 80。又張弦生在〈略說手抄本彈詞《三國志玉璽傳》〉一文中，亦嘗謂此鈔本「正文用毛邊紙抄寫，紙上有『吳義然號』、『川太史紙汪氏』等朱印。」見《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1 年第 10 期（曲阜：曲阜師範大學主辦，2011 年 10 月），頁 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探討。本文將以清初至乾隆間之刻本及稿、鈔本爲主要研究對象，兼及部分嘉慶、道光間之鈔本；擬對其中所鈐紙廠印記之內容、形制及部分印記形成之原因等，加以探討，並進而論述其在版本鑑定及造紙史研究上之價值。本文所論此時期之古籍，雖不若宋、元、明版之珍稀古舊，然就時代及學術價值而言，仍可歸於善本之列，故統以「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稱之。

今存宋代以降之古籍，多以紙作爲印刷或書寫之主要載體，故學者專家在論述古籍版本時，紙張亦每被列入版本鑑定所據項目之一，然通常並不作爲主要依據。如李致忠先生於《古書版本學概論》第三章「造紙術的發展與古書用紙的演變」第一節「造紙技術的發展」中云：

> 這一節，我們花了大量的筆墨，歷述了我國造紙術自東漢末年以來，一直到清代道光以前的發展概況。目的在於通過對歷代造紙原料、造紙地區、造紙質量、造紙品類等的介紹，使人們對紙張的特點及其演變有個粗略的了解，從而獲得一些對紙書（原注：「包括寫本書、印本書。」）的鑒定知識。當然，紙張並不能對古書版本鑒定起決定的作用，因爲後世用前世紙寫書、印書都是可能的。但在大的時代上總還可以幫助人們劃定界限。知道了這些，於版本鑒定顯然是有用的。[3]

李先生此處所言甚是。後世用前代之紙張以書寫或印刷，本極有可能，因此紙張僅能作爲版本鑑定之輔助項目。然若某一時代之刻本或稿、鈔本中，其紙張常出現某些外加之特徵（如鈐印），且非單一偶然之現象，則此特徵對古籍版本鑑定，當具有較高之參考價值，本文所擬探討之紙廠印記，蓋即是其例。

在傳世之文獻中，亦嘗記載清代以前有特殊之紙張鈐印者，如宋・陶穀所

3 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 1 版 3 刷），頁 36。

4 宋・陶穀：《清異錄》卷 4，〈文用門〉「剡溪小等月面松紋紙」條云：「先君畜白樂天墨跡兩幅，背之右角有方長小黃印，文曰：『剡溪小等月面松紋紙，臣彥古等上。』彥古得非守臣之名乎？」《陳眉公訂正清異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寶顏堂祕笈》本），卷 4，頁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撰《清異錄》卷下載其父所藏唐白居易墨跡兩幅，背面鈐有「剡溪小等月面松紋紙，臣彥古等上」方長小黃印，[4] 清・阮元所撰《石渠隨筆》卷八載元代舊紙中鈐有「端本堂」三篆字蠟印，[5] 明・方以智所撰《物理小識》卷八、明・蔣之翹所撰《天啓宮詞》、清・查愼行所撰《人海紀》卷下等皆記載明宣德貢箋中鈐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6] 可見在紙張上出現與紙張製造有關之鈐印，並非清代始有，唯此類清以前之紙張鈐印並非本文欲討論之重點，故暫不贅論。[7] 至於宋、元、明時期善本古籍中有關紙廠印記出現之情況，論者亦鮮，[8] 因囿於聞見，本文亦未及之，且俟來日探討。

---

5 清・阮元：《石渠隨筆》卷 8，「論紙簉」條云：「舊紙有端本堂紙，如金粟牋而少薄，其簾紋可見，上有『端本堂』三篆字蠟印。元奎文閣，後改端本堂，太子讀書處。」（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文選樓叢書》本），卷 8，頁 20。

6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 8，〈器用類〉「箋紙」條云：「永樂於江西造連七紙。奏本紙出鉛山，榜紙出浙之常山、廬之英山。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下略）」（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年，《續百子全書》影印清光緒刻本），卷 8，頁 1。明・蔣之翹《天啓宮詞》：「風沈銀蒜繡簾長，祇奉隃麋侍女皇。請得素馨宣貢紙，洛神摹卻十三行。」自注：「宣德中緜料貢紙，邊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學海類編》本），頁 29。又：清・查愼行：《人海記》卷下，「宣德紙」條云：「宣德紙有貢箋，有綿料，邊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書全書》影印清咸豐元年小娜嬛山館刻本），卷下，頁 14。

7 以上所述清以前紙張上之鈐印情形，資料參見潘吉星先生：《中國造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王菊華等著：《中國古代造紙技術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年），張秉倫、方曉陽、樊嘉祿合著：《中國傳統工藝全集・造紙與印刷》等書。唯諸家對此類資料之解讀，尚不無可再討論之處，容日後於他文探討。

8 清・于敏中等奉敕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於卷 2「宋版史部」中著錄「《唐書》十函一百冊」，考證云：「印紙堅緻瑩潔，每葉有『武侯之裔』篆文紅印，在紙背者十之九，似是造紙家印記，其姓爲諸葛氏。考宣城諸葛筆最著，而《唐書》載宣城紙筆並入土貢，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亦稱：『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則宣城諸葛氏亦或精於造紙也。」（臺北：廣文書局，1991 年，《書目續編》影印本），頁 11-12。此爲清人書目中論及宋代紙張印記之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之內容與形制

今所見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之紙廠印記，主要可分爲以下三種類型，舉例如下：

（一）第一種類型爲明言某廠、某號督造或選料之紅色長方印記。如「（前缺）廠督造古匡／荊川太史紙」、[9]「張嘉祥號選／料荊川太史」、[10]「福建／安隆盛號本／廠督造潔白／荊川毛八太／史紙貨發行」、[11]「廣大字號選／料紙貨發行」[12]等印記。[13]

（二）第二種類型爲僅有字號與紙品之紅色長方印記，或僅有字號之紅色長方印記。如「南浦廣大號／荊川太史紙」、[14]「新安胡源／裕號楠記」、[15]「吳正裕號」、[16]「吳正昌號」、[17]「吳正有號」、[18]「吳義然號」、[19]「旭祥

9 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徐宏祖撰：《徐霞客游記》，不分卷，清初鈔本。

10 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納蘭成德輯：《通志堂經解》，存一百三十六種，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刻本，詳下文討論。

11 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十三經註疏》中之《毛詩註疏》，清重刊汲古閣刻本。

12 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宋・張方平撰：《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清海鹽馬氏漢唐齋鈔本。

13 此處所列，以版本之時代較確定者爲主，他如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宋・呂祖謙撰：《東萊呂太史全集》，四十卷，館藏目錄題「明嘉靖甲申（三年，1524）安正書堂刊本」。此書中鈐有「姑蘇張文／本廠督造」紅色長方印，其版本時代可疑，則暫不列入，以下同此。

14 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姜宸英撰：《湛園集》，存二卷，清乾隆間藤梧館鈔本。

15 見臺北圖書館藏清・龔麗正編：《字書四種》，四卷，清仁和龔氏鈔本。

16 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清・王鳴盛撰：《尚書後案》三十卷，《後辨》一卷，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

17 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宋・楊仲良撰：《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存一百四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一年（1776）王氏鈔本，詳下文討論。

18 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朱令昭撰：《冰壑詩集》，六卷，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周永年進呈舊鈔本。

19 見鄭州市圖書館藏：《三國志玉璽傳》，清乾隆元年（1736）至二十年（1755）鈔本。參張弦生：〈略說手抄本彈詞《三國志玉璽傳》〉，同註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字號」、[20]「怡豐字號」[21]等印記。

（三）第三類爲長條形夾有某一文字片段或數個文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印記，或長條形僅有紅、藍色圖案而無文字片段之印記。

以上所述三種類型，其中第一類因有「本廠督造」、「督造」、「選料」等字樣，故較易判斷爲紙廠之印記，至於第二類及第三類印記，印記本身並未明白顯示爲紙廠所鈐，故需加以論證，此將於下節論之。除以上所述三種類型之印記外，另尚見有如「惠利何記」、[22]「惠亭何記」、[23]「貫之／吳記」[24]等印記，此類印記疑爲紙張販售商行所鈐，[25]故暫不列入討論。

二、紙廠印記之確認與考證

本節擬先以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康熙刻本納蘭成德輯《通志堂經解》中之印記爲主，進行考證，以確認長條形夾有文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印記爲紙廠印記。其次將以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清乾隆王氏鈔本《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中之印記爲主，以證「吳正昌號」等紅色長方印記爲紙廠所鈐。以下分別論之。

---

[20] 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王如鑒撰：《本草約編》十四卷，《本草選餘備考》二卷，清稿本。

[21] 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曹維城編：《六書辨正通俗文》一卷，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稿本。

[22] 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宋・樂史撰：《太平寰宇記》，存一百九十二卷，舊鈔本。

[23] 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清・王鳴盛撰：《尚書後案》三十卷，《後辨》一卷，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

[24] 見臺灣大學書館藏清・納蘭成德輯：《通志堂經解》，存一百三十六種，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刻本，詳下文。

[25] 以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康熙刻本《通志堂經解》爲例，其本所收宋・張載撰《橫渠易說》卷 3，頁 48b，鈐有「張嘉祥號選／料荊川太史」紅色長方印，此當爲紙廠印記，然此印之右下方又鈐有「貫之／吳記」紅色橢圓小印。另「貫之／吳記」橢圓小印之上方又有墨筆手跡五字，云「方行汪客收」。以此推之，疑「貫之／吳記」乃紙張販賣商行之印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長條形紅、藍色圖案印記之考證

今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清・納蘭成德輯《通志堂經解》一部，存一百三十六種，四百九十九冊，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刻本。[26] 此書因卷帙較夥，所出現之紙廠印記亦多，故可據以考證。茲就《通志堂經解》所收諸書中之印記分點論之：

1. 宋・張載《橫渠易說》卷 3，頁 48b（參書影一），[27] 及《古周易》頁 22b，二處均鈐有「張嘉祥號選／料荊川太史」紅色長方印記。[28] 據前節所述，此爲紙廠所鈐印記，當無疑問。

2.《橫渠易說》同書書末所附宋・呂大臨撰《橫渠先生行狀》頁 6a，鈐有一長條形印記，印記左方爲夾有「張」字上半之藍色圖案，右方爲夾有「嘉」字（大部分）之紅色圖案（參書影二）。[29] 另宋・朱元昇撰《三易備遺》卷 3，頁 28a，又見鈐有另一長條形印記，印記右方爲夾有「張」字下半之藍色圖案，左方爲夾有「祥」字全形白文朱方小印之紅色圖案（參書影

[2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編輯、周駿富審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增訂善本書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11 年 6 月）著錄云：「《通志堂經解》，存一百三十五種，四百九十九冊，（清）納蘭成德輯，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通志堂刊本。」頁 680。今考此書缺《孝經》類經解四種，實存一百三十六種。又此部《通志堂經解》書中見有闕版現象，當非初印之本，然其刷印時代當亦不致太晚。考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清康熙刻本《二家詩鈔》一部，清・邵長蘅選輯。《二家詩鈔》中所收清・宋犖撰《宋氏綿津詩鈔》卷 5，頁 23b，鈐長條形夾有「新」字、「記」字片段之藍色圖案印記，此印記亦見於臺灣大學藏《通志堂經解》所收元・詹道傳撰《孟子集註纂箋》卷 6，頁 19b 中。此二書所用紙張來源既同，則刷印之時代蓋亦相近也。《二家詩鈔》鈐印書影，承北京清華大學科學技術史暨古文獻研究所劉薔教授賜贈，謹致謝忱。

[27] 「頁 48b」，意謂第 48 頁之後半頁，以下敘述皆同。

[28] 此二印記之文字，皆與刻本中文字之方向倒反。

[29] 此長條形印記中之文字，「張」字上半片段居左，「嘉」字居右。「張」字上半片段爲藍色，「嘉」字爲朱文小圓印，「嘉」字上方略有缺損，然仍清楚可識。「嘉」字下方有一白文小方印，僅存上半段一小部分，當是「祥」字之片段。另「嘉」字右方有紅色圖案，當是人像圖形中段之一部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30] 此等印記，既出現「張」、「嘉」、「祥」等字，可證當與「張嘉祥號」紙廠有關，皆爲紙廠之印記。再者，由此「張」字片段之藍色圖案與「嘉」、「祥」紅色圖案出現之相對位置觀之，「張」字或居左，或居右，並未固定，可見此乃分別由紅、藍二印所鈐，其所存片段共同呈現於一條狀區域中，遂形成此長條形印記。其成因俟下節詳論。同理可推，他處見鈐僅夾有文字片段之圖案，或出現僅有紅、藍色圖案而無文字片段之印記，所存留雖較不完整，然亦可斷定爲紙廠之印記。

3. 元・李簡撰《學易記》卷 9，頁 5a、元・俞琰撰《俞氏易集說》上經，頁 39a、元・詹道傳《孟子集註纂箋》卷 6，頁 19a 等處，皆見長條形夾有文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鈐於刻本文字之背面，[31] 由此可證，此等印記當鈐於此刻本印刷之前，其非印書者或販書者之印記，亦可知矣。

4. 宋・呂大圭撰《春秋或說》卷 8，頁 4，a、b 二面皆爲原版文字已完全殘缺，僅刻邊框、版心及行線，[32] 其頁 b 面鈐長條形夾有文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印記，其文字爲「選料／廠／號」等字之部分片段。另元・趙汸撰《春秋集傳》卷 2，頁 4a，鈐長條形夾有文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印記，其文字爲「選料／定廠／號」等字之部分片段。此等印記與上述「張嘉祥號」紙廠所鈐長條形夾有文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印記文字有別，蓋非同家紙廠所鈐。考此等印記中出現有「選料」、「廠」等字樣，亦可判斷爲紙廠印記。

5. 宋・衛湜撰《禮記集說》卷 126，頁 10a，鈐長條形夾有「新」字上半

[30] 此長條形印記中之文字，「張」字下半片段居右，「祥」字全形居左。「張」字下半片段爲藍色，「祥」字爲白文朱方小印，「祥」字上方有一紅色小圓印下半段之一小部分，當是「嘉」字小圓印之殘留。「祥」字之右方（即「張」字下半片段之左方）緊接爲紅色圖案，當是人像圖形中段之一部分。以此推之，「嘉」、「祥」二印與紅色人形圖案當爲同一組合。

[31] 此處所謂「鈐於刻本文字之背面」，乃言紙張有正、反二面，刻本中印有文字之部分爲正面，此印記則鈐於反面。

[32] 此乃爲顯示書中原版之闕版，然版心中段仍鐫書名、卷次及頁次，下方鐫「通志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藍色印記。元・詹道傳撰《論語集註纂箋》卷 10，頁 13b，鈐夾有「陽」字中段並紅色人像圖案上段之長條形印記。[33] 另元・程端學撰《春秋本義》「春秋本義點抹例」頁 2a，鈐夾有「陽」字下半並紅色人像圖案上段之長條形印記。[34] 此等印記當爲帶有「新」字、「陽」字字號之紙廠印記。由此推之，此部《通志堂經解》中之印紙，除採用「張嘉祥號」紙廠出產之紙張外，亦兼採他家紙廠之產品。

由以上所考，可證長條形夾有文字片段或未夾文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印記，當爲紙廠印記無疑。其他清代善本古籍中若出現此等長條形圖案印記，其爲紙廠印記，亦從而可知也。

（二）「吳正昌號」等印記之考證

今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有宋・楊仲良撰《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清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一年（1776）王氏鈔本一部，存一百四十二卷，二十四冊。[35] 此書卷 4 之末有手書題記云：「乾隆四十年九月，囑表弟朱象乾抄完首本計八十八頁，俟抄成全書，當校其譌處，此時固無暇晷也。鶴谿王鳴韶書。」又卷 46 之末，題記云：「乾隆丁酉四月，金閶寓邸督僕人抄四十三卷至四十六卷畢，因識於後。鶴谿主人王鳴韶。」另全書之末，有題記云：「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寫畢。鶴谿王鳴韶記。」據王鳴韶之題記，則此書鈔寫之時間爲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一年（1776），年代極爲明確。

此書之目錄、卷 87、卷 105、卷 142 等處皆見鈐有「吳正昌號」之紅色長方印記（參書影四）。[36] 另目錄、卷 73、卷 142 見鈐長條形夾有「吳」字片

[33] 此印記，「陽」字中段爲藍色，居右；另紅色人像圖案爲頭部部分，居左。

[34] 此印記，「陽」字下半片段爲藍色，居左；另紅色人像圖案爲頭部部分，居右，然頭部露出部分反比上一印稍多。由以上二印「陽」字與人像圖案二者相關位置之差異現象而觀，可知此長條形印記亦分別由紅、藍二印所鈐而形成。

[35] 索書號：230.251 02004。

[36] 此印記爲紅色長方印，「吳正昌號」四字居中，四周飾有花紋。又此印記出現之位置，皆在紙張前半頁之邊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段之紅、藍色圖案印記（參書影五）。卷 67 之末，鈐夾有「廠」字之長條形紅、藍色圖案印記。尤其卷 142 中所見，a 面鈐「吳正昌號」紅色長方印記，b 面則鈐長條形夾有「吳」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印記。由以上所見之現象而觀，長條形夾有「吳」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印記既可知爲紙廠印記，則「吳正昌號」，紅色長方印記亦當爲紙廠之印記。依理推之，其他「吳正裕號」、「吳正有號」、「吳義然號」等紅色長方印記，當亦皆爲紙廠之印記。

三、紙廠印記呈現長條形片段面貌之原因蠡測

清代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其中有面貌較完整者，如「姑蘇張文／本廠督造」、「張嘉祥號選／料荊川太史」、「吳正昌號」、「吳正裕號」等紅色長方印，此類印記，較易辨識，其印記之形成可不用多論。然長條形夾有文字片段或未夾有文字之紅、藍色圖案印記，其如何形成？原因則較難理解，以下試略作蠡測。

此類印記多爲長條形紅、藍色圖案，[37] 圖案中多夾有某一文字或數個文字之片段，其片段或爲上半段，或爲下半段，或爲中段部分，亦有僅見紅、藍色圖案而無文字者。此類印記，於同一部古籍或同一廠號出產之紙張中，其出現之位置大致有其共通性。以前節所述臺灣大學圖書館藏《通志堂經解》爲例，此類印記多出現於版頁之前半頁，距版心約四行字之位置（參書影六）。然他書此類印記亦有鈐於版頁之後半頁者。[38] 若將此類印記之文字片段加以拼湊，部分文字可以辨識其字形，如「張」、「陽」、「吳」、「號」、「記」、「印」、「選料」等，然同一文字之上、中、下片段卻分別出現於不同紙張之

[37] 紅色圖案中亦有可推知爲人像圖案之片段者，參見前節所述。

[38] 如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宋・王象之撰：《輿地紀勝》，存一百六十八卷，道光二十八年（1848）楊州岑氏懼盈齋綠格鈔本，此書中所鈐夾有文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印記即出現於其頁之後半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一位置，則此必非同一次鈐印分布於不同紙張上所致。[39] 推其原因，留有此類印記之紙張，在包裝時當是置於第二張，其上尚有一張表紙，[40] 表紙包裝時留有一長條形間距，並未完全密封。紙廠鈐印時即鈐於包含表紙與間隙之位置，[41] 以致紙廠印記大部分鈐於表紙上，小部分則出現於次張紙上，其存留於次張紙上者，乃形成長條形之圖案。由於鈐印之位置雖大致有其範圍，但非完全固定不變，其位置仍有些微差異，故同一紙廠印記，其存留於次張紙上之文字及圖案，乃有上段、中段、下段之差異，然歸結其原因，乃是同一廠號印記在不同時間、不同紙張上所鈐印之結果。又：此類長條形圖案印記，每呈現受重壓而略爲凹陷之痕跡，亦可推乃鈐印時所致。

以上所論，期在推測長條形紅、藍色圖案印記形成之原因。今所見清代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時見與「荊川太史紙」有關，此類紙張，乃屬於質料較佳之品類，[42] 或因是之故，此類紙張雖存留有片段紙廠印記，印刷者或書寫者仍不忍棄置，遂留下此項鮮明之特徵。

---

39 若爲同一次鈐印而印記分佈於不同紙張上者，則其位置必有差異。且此類印記多不出現於紙張之邊緣，亦不可能同一次鈐印而各片段分別出現於不同紙張之同一區域。

40 此處言「表紙」，而不言「封面紙」，乃因難以斷定最外面之第一張紙是否必爲另製之封面紙。

41 其作用，蓋如現今之「騎縫章」。

42 「荊川太史紙」自明代已有生產，清・葉夢珠撰《閱世編》卷七中云：「竹紙如荊川太史連、古筐將樂紙，予幼時七十五張一刀，價銀不過二分，後漸增長。至崇禎之季，順治之初，每刀止七十張，價銀一錢五分。馴至康熙丁未，每刀不過一分八釐。自甲寅春，閩中兵變，價復驟長，每刀又至一錢四、五分，往往以浙中所產醜惡者充賣。至十五年丙辰九月，耿藩歸正，而後紙價漸平。今每刀七十張，價銀三分五釐，庶幾去舊不遠。至康熙二十六年，每刀不過紋銀二分，竟復古矣。」（北京：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叢刊》42，來新夏點校，2007 年），頁 183。此處葉夢珠詳細紀錄荊川太史連紙自明末至清康熙間價錢之升降，頗有助於對荊川太史紙之瞭解。至於明代荊川太史紙紙廠印記之情況，尚待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紙廠印記在版本研究上之價值

（一）可作爲版本鑑定之佐證

紙廠印記雖不能作爲版本鑑定之主要依據，然因清代善本古籍中此類紙廠印記有其鮮明特徵，且非單一偶然現象，故透過此類紙廠印記之佐證，可在版本鑑定上發揮其作用。以下試舉二例以論之。

1.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明・錢一本所撰《像抄》六卷，四冊。《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增訂善本書目》著錄爲「明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蘭雪堂刊本」。[43] 此本扉頁，中題「易像抄」，右上題「明錢啓新先生著」，左下題「蘭雪堂藏板」。書首有著者所撰〈像抄引〉，末署「萬曆四十一年癸丑春孟之吉毘陵錢一本識」，《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增訂善本書目》定爲「明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蘭雪堂刊本」者，蓋即據扉頁及〈像抄引〉所署之年代也。

今考此本當非明萬曆間之刻本，其扉頁題「明錢啓新先生著」，若此本刻於明代，自不需題「明」。考錢一本之玄孫錢濟世，嘗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重刊錢一本之《範衍》，錢濟世於重刊本《範衍》書末識云：「右先高王父侍御公所著《範衍》凡十卷，共四百餘頁，原版朽蠹已過半，濟世刊補《像抄》、《像象管見》諸書成，因以餘力及之，參互考訂，亦出妹夫湯子鳴友力。」[44] 識語之末，署「康熙歲次甲申仲冬月文林郎知惠安縣事玄孫濟世謹識」。[45] 由此識語可知，錢濟世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重刊《範衍》之

[43] 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增訂善本書目》，頁 14。又：此書《增訂善本書目》題作「《像鈔》」，今據卷端所題，改作《像抄》。

[44] 見《範衍》書末錢濟世識語，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405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

[45]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已嘗有刊補《像抄》之舉，然則今臺灣大學所藏本《像抄》當即是錢濟世所刊補之康熙本也。[46]

今復以臺灣大學所藏此本《像抄》中所鈐之紙廠印記以作爲其係康熙刻本之佐證。考此本《像抄》卷上，頁 131，a 面天頭空白處鈐有「子輶吳記」紅色長方印，b 面鈐長條形夾有文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印記，其文字僅存中段部分，可推斷爲「李」字（參書影七）。此外，卷 3，頁 23a，亦見長條形藍色圖案印記，鈐於刻本文字之背面。依前節所考，此種夾有文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印記，爲紙廠印記，常出現於清初至乾隆年間之刻本及稿、鈔本中，此正與前文所推斷此本《像抄》乃康熙年間刻本之時代相合，可作爲一有力之佐證。[47] 反之，若鑑定者熟悉此類紙廠印記，當其見古籍中鈐有此類紙廠印記而題明萬曆刻本時，則將啓疑也。

另《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14 冊，收錄《象抄》六卷，題云：「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48] 今以《存目叢書》影印本與臺灣大學所藏本相比對，兩者當爲同一版本，則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題「明萬曆刻本」，恐亦有未當。

---

[46] 錢濟世嘗有重刊《範衍》一事，參見劉勇撰〈「文以人重」：從胡居仁與《易像鈔》看《四庫提要》之纂修〉中所述。文刊《燕京學報》新 21 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11 月），頁 107-137。

[47] 今所見鈐有此類紙廠印記之清代善本古籍，其最早可推至何時，尚難確定，唯必不晚於康熙年間。考臺灣大學藏有汲古閣刻本《十三經註疏》原刻本一部，重刻本三部。其中原刻本（登錄號：0103464-0103529）之書首空白頁有馬維駒墨筆識語云：「康熙甲申，先大夫人秋湄先生乾樓收閱。」下署「雍正甲辰男駒敬識」。此本書首所載明・張國維〈重刻十三經註疏序〉，第一頁 a 面，鈐有長條形紅、藍色圖案印記，由此可知，此類印記之出現必不晚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也。又清・胡渭：《禹貢錐指》二十卷附《平成頌》一卷（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年〔1701〕漱六軒刻，四十四年〔1705〕增補印本），其本〈禹貢圖〉頁 20a 亦鈐有長條形紅、藍色圖案印記，此印記出現之時代亦在康熙年間。

[48] 見《象抄》書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14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有明・章潢撰《圖書編》三部，其中一部館藏目錄題「明萬曆癸丑（四十一年，1613）涂鏡源等刊，天啓癸亥（三年，1623）岳元聲印本」，一百二十七卷，六十四冊。[49] 考此本卷 13，頁 49 至頁 64 間，版面屢見漶漫之處；又卷 77，頁 11a 云：「唐太宗正觀二年，頡利可汗入朝。」此處「貞觀」作「正觀」，蓋避清諱。[50] 則此本題「天啓癸亥（三年，1623）岳元聲印本」，恐有可疑。

今試以此本《圖書編》中之紙廠印記作爲其書非明天啓印本之佐證。此本卷 77，頁 83b（亦即卷 77 之末）鈐有「仁豐字號」紅色長方印記；[51] 卷 17，頁 65b，鈐有長條形藍色圖案印記；卷 36，頁 33a，鈐長條形夾有某一文字片段之藍色圖案印記，其文字不可辨識；卷 42，頁 16a，鈐長條形夾有某一文字之黑、紅圖案印記，黑色當係由藍色褪色而成；卷 52，頁 11a，鈐長條形夾有「號」字片段之藍色印記。此外，尚有多處見鈐有長條形黑色圖案之印記，當原皆係藍色，因褪色而成黑色。考今存清嘉慶、道光間之鈔本中，屢見鈐有「仁豐字號」紅色長方印，如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有元・夏文彥撰《青樓集》鈔本一部，一卷一冊，館藏目錄題：「清嘉慶己巳（十四年，1809）丁竹浯手鈔本」。[52] 此本書末有清・黃丕烈朱筆跋語云：「嘉慶己巳中秋十有三日，友人招飲于山塘，便道過訪陳仲魚，見案頭有鈔本《青樓集》，遂攜歸，屬內侄丁竹浯傳錄以備閒居流覽云。是日席上侑酒者，有張氏素芳，一時色藝冠絕流輩，並記。」[53] 據此跋所載年月，則此鈔本係謄寫於嘉慶十四年（己巳，1809），確然可信。此鈔本書末，元・張鐸序之末頁，鈐有「仁豐字號」紅色

[49] 見臺北「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索書號：309 08088。

[50] 他處仍多見作「貞觀」而不避「貞」字者，如卷 77，頁 16a：「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荊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下略）」此處仍作「貞觀」，則沿明刻之舊。

[51] 此「仁豐字號」紅色長方印記鈐於卷 77，第 83 頁後半頁之左方邊緣，方向與刻本文字倒反。又原印「豐」字作「豊」，當爲「豐」字之俗體。

[52] 索書號：205.1 02405。

[53] 此跋後亦收入清・繆荃孫、章鈺等編《藕圃藏書題識》（卷 6，頁 29）中，見《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編（十三）》（清代卷，第 7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長方印記。[54] 臺北國家圖書館另藏有宋・王象之撰《輿地紀勝》鈔本一部，存一百六十八卷，六十冊，題「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楊州岑氏懼盈齋綠格鈔本」。[55] 此本卷 135 至卷 145 爲闕卷，鈔本代之以鐫有綠格行線之文字空白頁，其中空白頁第 2 頁、第 3 頁、第 4 頁之 a 面皆鈐有「仁豐字號」紅色長方印記。[56] 另卷 165 卷末空白頁 a 面亦鈐有此印。此外，尚有多處亦鈐有此印，茲不贅述。今上述《青樓集》鈔本、《輿地紀勝》鈔本既皆鈐有「仁豐字號」紅色長方紙廠印記，且可知各鈔於嘉慶、道光年間，則《圖書編》亦見鈐有此印，其題爲「天啓癸亥（三年，1623）岳元聲印本」，恐不確也。

以上略舉二例，以見紙廠印記在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上之價值。除以上所舉二例之外，清代善本古籍中經常出現之紙廠鈐印，如「吳正裕號」、「吳義然號」，因其出現較爲頻繁，可作爲清代某時期刻本或稿、鈔本刻、寫時代判斷之佐證，[57] 其價值亦值得重視。

（二）可供善本書志撰寫之取材

紙廠印記以往或因未受到足夠重視，故學者專家撰寫善本書志時，尚著墨不多。以今已出版之善本書志觀之，臺北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

[54] 此印記鈐於此頁前半頁之右方邊緣。原印「豐」字亦作「豊」，與《圖書編》所鈐印記同。

[55] 索書號：210.1 03188。

[56] 此「仁豐字號」紅色長方印記，皆鈐於各頁前半頁之右方邊緣。「豐」字亦作「豊」。

[57] 以「吳正裕」紅色長方印記爲例，其印記屢見於清乾隆年間之刻本或鈔本中，如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清・王鳴盛撰：《尚書後案》三十卷，《後辨》一卷，清乾隆四十五年（1708）刻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清・葛萬里撰：《別號錄》八卷，《前編》一卷，清乾隆間南昌彭氏知聖道齋鈔本；臺灣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元・托克托等奉敕修：《金史》，一百三十五卷，據清乾隆四年（1739）校刊本修補印本等皆鈐有「吳正裕號」紅色長方印記。然則，若其他古籍中見鈐有此印記者，其印刷之時代當與此不甚相遠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初稿》中嘗記載相關之印記，[58] 另沈津先生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中亦偶有述及。[59] 然整體而言，清代善本古籍中所鈐之紙廠印記，在善本書志中尚未能得到充分之反映。[60] 紙廠印記既有版本鑑定上之參考價值，又可提供其他學術領域（如造紙史，見下文）研究之用，則未來撰寫善本書志時，宜考慮將紙廠印記列入取材之範圍。

然由於此類印記，以往尚鮮受關注，故偶亦易被誤解。如臺北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中，有將紙廠印記誤爲書店章者，「子部（三）」明・黃道周撰《博物典彙》二十卷一書，《初稿》云：「目錄上鈐有『吳見塘號□』朱文長方印（書店章）。」[61] 今考此本《博物典彙》目錄頁 17，a 面鈐有長條形夾有文字片段之藍色圖案印記，b 面則鈐有「吳見塘號」

58 以其書首見之處爲例，《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臺北：國家圖書館，1996 年）於「《周易本義》四卷二冊，明崇禎十四年（1641）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一書之書志中云：「書中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澤存／書庫』朱文方印、『吳正有號』朱文長方印四周飾以花紋。」（頁 12）此處載及「吳正有號」印記。另亦有明言「紙廠印」者，如《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史部（一）》（臺北：國家圖書館，1997 年）「《食蹟軒史記鈔》六卷十二冊，清道光七年（1827）許氏手定底稿本」一書之書志中云：「書中有一紙廠印『拆荊川太史』。」（頁 18）

59 如《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史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於「清抄本《湖北金石詩》」一書之書志中云：「最末一頁蓋有紙鋪木記二方，一方爲圓印『河』字，一方爲長方印，上端橫書『福建』二字，下端豎書『集義字號，本廠自造選料加重毛太剔破毛錄，馳名紙貨發行』。全文錄下，或可爲治印刷史者參考。」（頁 826）

60 中文善本書志之外，善本目錄中偶亦有述及與紙廠印記有關之印記者，如謝鶯興於〈館藏善本書簡明目錄——史部・正史類〉一文中，於「《金史》一百三十五卷附《考證》一百三十五卷二十四冊，元・托克托等奉敕修，清・臣宗楷、臣浩等考證，據清乾隆四年（1739）校刊本補修本」一書之目錄下，按云：「卷一之葉十二、卷九之葉十四鈐有『吳正裕號』長型硃印，第三冊之末葉鈐有『惠利何記』長型硃印，第五冊之末葉鈐有『吳正有號』長型硃印，第十三冊之末葉鈐有『旭祥字號』長型硃印。」《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51 期（臺中：東海大學圖書館，2005 年 12 月 15 日），頁 12。其中「吳正裕號」、「吳正有號」、「旭祥字號」皆爲屢見之紙廠印記，可資參考。

61 見《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三）》（臺北：國家圖書館，1998 年），頁 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紅色長方印，「號」下當無缺字。以「吳正裕號」、「吳正昌號」、「吳義然號」等紙廠印記例之，此「吳見塘號」當亦爲紙廠印記，而非書店章也。

未來若能搜集更多有關清代善本古籍中曾出現之紙廠印記，對此有更充分之瞭解，當可提高其學術利用價值。

五、紙廠印記在造紙史研究上之價值

錢存訓先生在《紙與印刷》之〈緒論〉中嘗云：「紙在各地的製造及運銷以及紙的各種用途，至今尚無有系統地深入研究。」[62] 錢先生所言此一現象，經由學者專家數十年來之努力，大部分已獲得較深入之探討，然有關「紙在各地的製造及運銷」問題，至今仍有待作更具體深入之研究。

清代善本古籍中所鈐之紙廠印記，應可提供造紙史研究者作爲研究之材料。若能廣泛搜集各種紙廠印記資料，加以歸納分析，並結合其他史料、文獻，則對造紙史之研究必將有所貢獻。例如紙廠印記中有「金陵光裕堂選／料潔白太史連」、[63]「南浦廣大號／荊川太史紙」、「福建／安隆盛號本／廠督造潔白／荊川毛八太／史紙貨發行」（參書影八）此類帶有產地、廠號及紙張品類之印記，對清代荊川太史紙產區之研究，當可提供寶貴之信息。又如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有明・吳履震撰《五茸志逸》八卷舊鈔本一部，[64] 其書卷二目錄鈐有「達成詹記頂／拆荊川太史」紅色長方印，此當爲與荊川太史紙製造或銷售有關之印記，然「頂拆」二字意義爲何？恐仍有待造紙史專家之研究與解答。

62 中文譯文見錢存訓先生著，劉拓、汪劉次昕譯：《造紙及印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初版二刷），頁 31。

63 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舊題宋・范堳、林禹撰，明・錢德洪增訂：《吳越備史》六卷附《雜考》一卷，舊鈔本。

64 索書號：210.8 040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　論

有關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紙廠印記之研究，目前尚處於剛起步之階段，仍有極多資料有待搜集，甚多現象有待探索。本文主要對清代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作初步之探討，分析其內容與形制，利用《通志堂經解》、《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等二書中之鈐印以論證其確爲紙廠印記。此外亦探討此類印記中長條形每夾有文字片段之紅、藍色圖案印記形成之原因，推測其當是紙廠鈐印於表紙及間隙處，在次張紙上所存留之痕跡。紙廠印記以往尚未受到足夠重視，故論者尚鮮，已出版之善本書志中亦著墨不多，本文以《像抄》及《圖書編》二書爲例，論述紙廠印記在版本鑑定上之價值，並建議未來撰寫善本書志時，宜考慮將紙廠印記列入取材之範圍。此外，紙廠印記對紙張之品類、產區與廠號等提供寶貴之信息，在造紙史之研究上亦有其價值。透過紙廠印記之探討，可使造紙與印刷此兩種領域之研究，產生更緊密之關係，值得未來作更深入之研究。

附記：本文之研究，發端於 2009 年 8 月至 2011 年 2 月在芝加哥大學訪問期間，其時正從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經部善本書志》之撰作，屢見善本古籍中鈐有長條形之紅、藍色奇異圖案，與周原館長對此圖案時共討論、析疑。返臺後續作探索，終得草成此文，以就教方家。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周原館長，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郭嘉文主任、蔡碧芳副理，臺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俞小明主任、黃文德編輯等，或提供良好之研究環境，或協助調閱珍藏圖書，或惠賜教言，謹此一併致謝。又：本文初稿，曾於 2012 年 5 月 11-13 日，在芝加哥大學舉行之「文本中國：現代中國以前文本資料之構成、傳遞與保存」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

（責任校對：傅凱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十三經註疏》三百三十三卷，明崇禎元年（1628）至十二年（1639）汲古閣刻本。（臺灣大學圖書館藏，以下簡稱「臺大藏」）

《十三經註疏》三百三十三卷，清重刊汲古閣刻本。（臺大藏）

宋・楊仲良：《皇朝通鑑紀事本末》存一百四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一年（1776）王氏鈔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以下簡稱「臺北國圖藏」）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存一百九十二卷，舊鈔本。（臺北國圖藏）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存一百六十八卷，道光二十八年（1848）楊州岑氏懼盈齋綠格鈔本。（臺北國圖藏）

宋・陶穀：《陳眉公訂正清異錄》四卷，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寶顏堂祕笈》本。

宋・張方平：《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清海鹽馬氏漢唐齋鈔本。（臺北國圖藏）

宋・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全集》四十卷，館藏目錄題「明嘉靖甲申（三年，1524）安正書堂刊本」。（臺北國圖藏）

元・托克托等奉敕修：《金史》一百三十五卷，據清乾隆四年（1739）校刊本修補印本。（臺灣東海大學圖書館藏）

＊元・夏文彥：《青樓集》一卷，清嘉慶己巳（十四年，1809）丁竹浯手鈔本。（臺北國圖藏）

明・錢一本：《像抄》六卷，題「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蘭雪堂刊本」。（臺大藏）

明・錢德洪增訂：《吳越備史》六卷附《雜考》一卷，舊題宋范坰、林禹撰，舊鈔本。（臺北國圖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記》不分卷，清初鈔本。（臺北國圖藏）

明・吳履震：《五茸志逸》八卷，舊鈔本。（臺北國圖藏）

明・錢一本：《範衍》十卷，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故宮珍本叢刊》第 405 冊。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十二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年，《續百子全書》影印清光緒刻本。

明・章潢：《圖書編》一百二十七卷，題「明萬曆癸丑（四十一年，1613）涂鏡源等刊，天啓癸亥（三年，1623）岳元聲印本」。（臺北國圖藏）

明・黃道周：《博物典彙》二十卷，明崇禎乙亥（八年，1635）刊本。（臺北國圖藏）

明・蔣之翹：《天啓宮詞》一卷，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學海類編》本。

＊清・納蘭成德輯：《通志堂經解》存一百三十六種，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刻本。（臺大藏）

清・胡渭：《禹貢錐指》二十卷附《平成頌》一卷，清康熙四十年（1701）漱六軒刻，四十四年（1705）增補印本。（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清・王鳴盛：《尚書後案》三十卷，《後辨》一卷，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清・曹維城：《六書辨正通俗文》一卷，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稿本。（臺北國圖藏）

清・龔麗正編：《字書四種》四卷，清仁和龔氏鈔本。（臺北國圖藏）

＊清・于敏中等奉敕編：《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十卷，臺北：廣文書局，1991 年，《書目續編》影印本。

清・黃丕烈撰，清・繆荃孫、章鈺等編：《蕘圃藏書題識》，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十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王如鑒：《本草約編》十四卷，《本草選餘備考》二卷，清稿本。（臺北國圖藏）

清・葉夢珠撰，來新夏點校：《閱世編》十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清代史料筆記叢刊》42。

清・阮元：《石渠隨筆》八卷，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文選樓叢書》本。

清・查慎行：《人海記》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咸豐元年（1851）小娜嬛山館刻本。

清・朱令昭：《冰壑詩集》六卷，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周永年進呈舊鈔本。（臺北國圖藏）

清・姜宸英：《湛園集》存二卷，清乾隆間藤梧館鈔本。（臺北國圖藏）

清・邵長蘅選輯：《二家詩鈔》二十卷，清康熙間刻本。（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二、近人論著

王菊華等著：《中國古代造紙技術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

＊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1版3刷。

沈　津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張秉倫、方曉陽、樊嘉祿合著：《中國傳統工藝全集・造紙與印刷》，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5年。

張弦生：〈略說手抄本彈詞《三國志玉璽傳》〉，《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1年10期，曲阜：曲阜師範大學主辦，2011年10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編輯，周駿富審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增訂善本書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11年。

＊臺北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史部、子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北：國家圖書館，1996、1997 年。

＊潘吉星：《中國造紙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劉　勇：〈「文以人重」：從胡居仁與《易像鈔》看《四庫提要》之纂修〉，《燕京學報》新 21 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11 月。

錢存訓著，劉拓、汪劉次昕譯：《造紙與印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初版二刷。

＊賴貴三：〈《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經部・易類》考釋（上）〉，《中國學術年刊》第 24 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印行，2003 年 6 月。

謝鶯興：〈館藏善本書簡明目錄——史部・正史類〉，《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51 期，臺中：東海大學圖書館，2005 年 12 月 15 日。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ilography

Lai, K.-S. (2003). Study of *Outline of Siku Complete Works; Category Yi, Division: Classics*-Manuscript compiled by Weng Fang-gang, part I. *Studies in Sinology*. (24), 77-106.

Li, Zh.-Zh. (2003). *Gu shu ban ben xue gai lun* [Introduction to editionology of ancient books].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Nalan, Ch.-D. (Ed.). (1680). *Tong zhi tang jing jie* [136 commentaries on Chinese classics] (Tong Zhi Tang woodblock print e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Ed.). (1996-1997). *Guo jia tu shu guan shan ben shu zhi chu gao: Jing bu*. [First record of the rare books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lassics].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Ed.). (1996-1997). *Guo jia tu shu guan shan ben shu zhi chu gao: Shi bu*. [First record of the rare books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History].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Ed.). (2011). *Chinese rare books in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Rev. ed., J.-F. Zhou, Proofread).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Pan, J.-X. (2009). *Zhong gue zao zhi shi* [History of Chinese papermaki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Shi san jing zhu shu [*Thirteen classics commentaries* with annotations and subannotations] (J. Mao, Make plate). (1628-1639).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Taipei.

Shia, W.-Y. (1809). *Qing lou ji* [Record of female entertainers] (Zh.-W. Ding, Transcrib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Yuan Dynasty)

Wang, M.-Sh. (1780). *Hou bian* [Verification of the *Book of documen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East Asian Library, Chicago.

Wang, M.-Sh. (Annot.). (1780). *Shang shu hou an* [*Book of documents* with final annot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East Asian Library, Chica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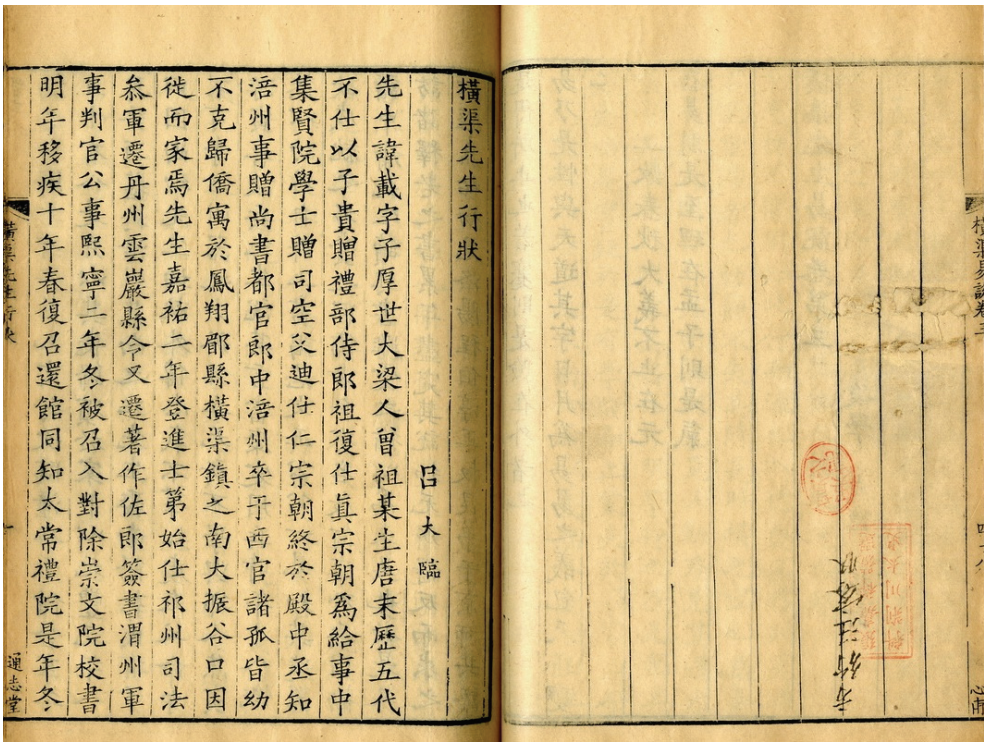
Yu, M.-Zh., et al. (Eds). (1991). *Qin ding tian lu lin lang shu mu* [Catalog of Emperor Qianlong's *Tianlulinlang* imperial collection of books]. Taipei: Kwangw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

書影一：「張嘉祥號選／料荊川太史」

（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藏《通志堂經解》）


橫渠先生行狀

呂大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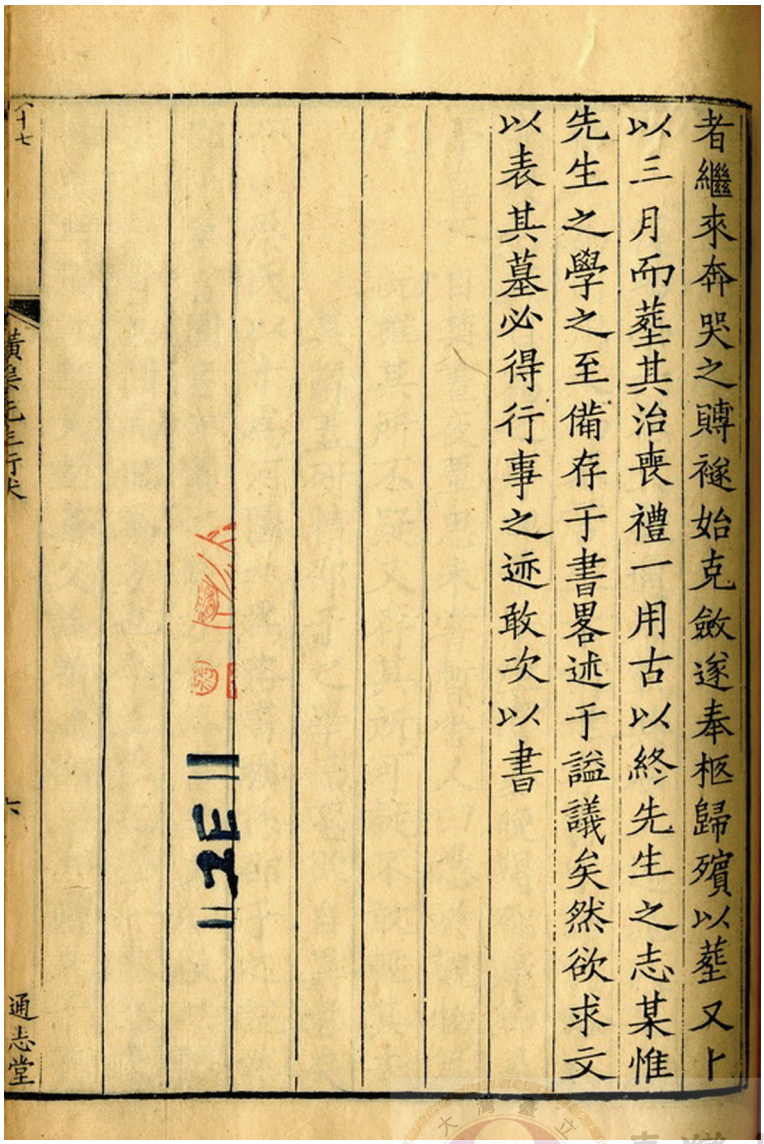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仕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



→印記反向放大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影二：長條形夾有「張」字上半及「嘉」字大部分的紅、藍色圖案印記
（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藏《通志堂經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影三：長條形夾有「張」字下半及「祥」字全形的紅、藍色圖案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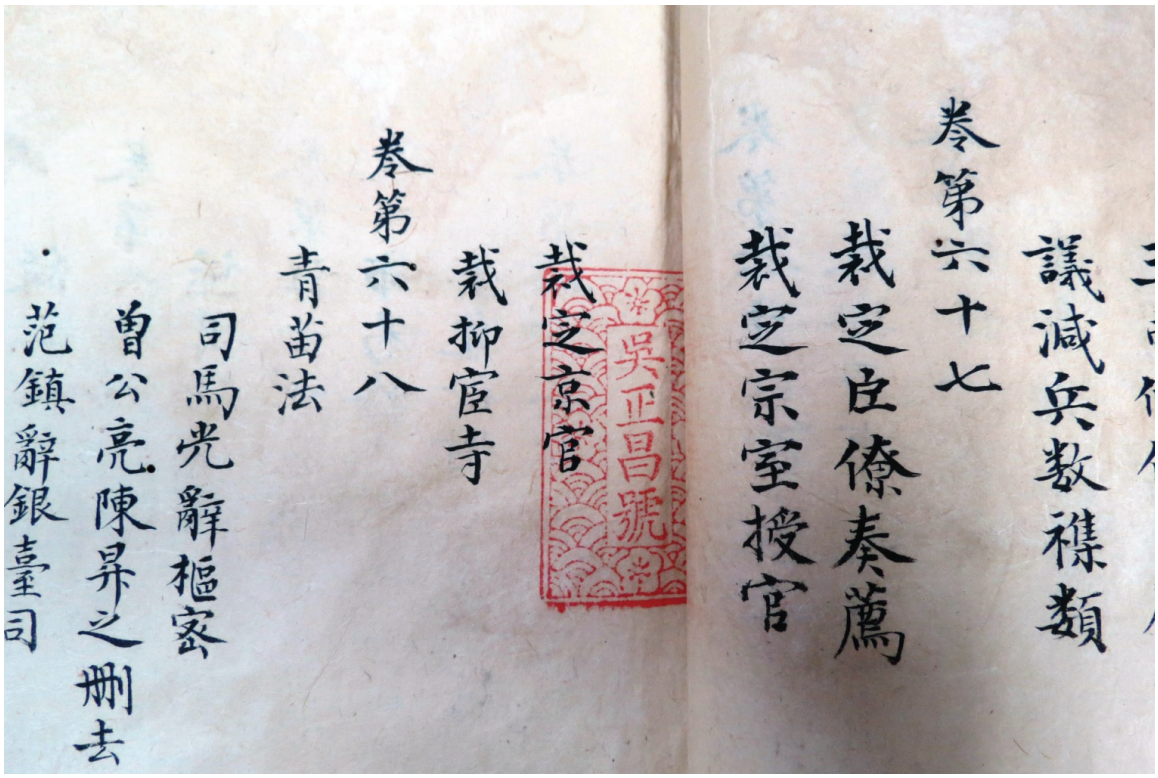
（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藏《通志堂經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影四：「吳正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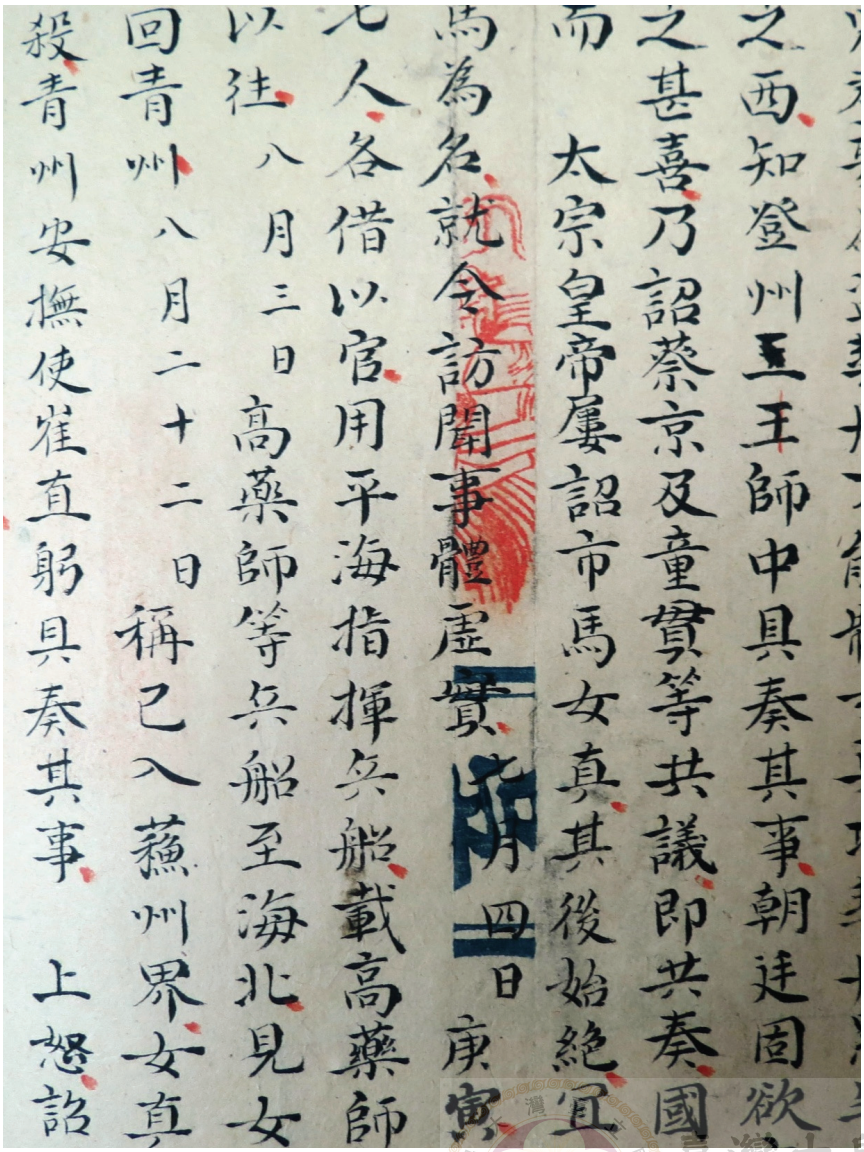
（來源：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影五：長條形夾有「吳」字上半的紅、藍色圖案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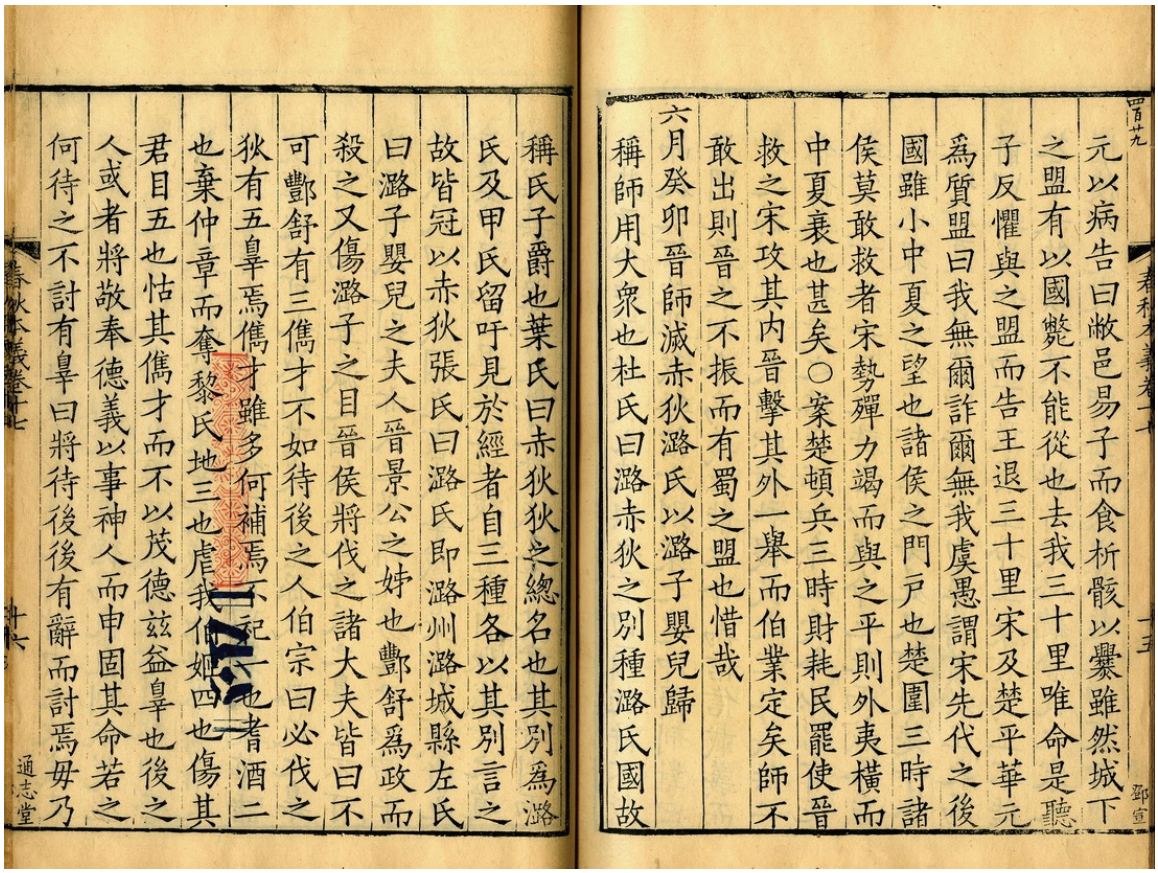
（來源：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影六：長條形夾有文字的紅、藍色圖案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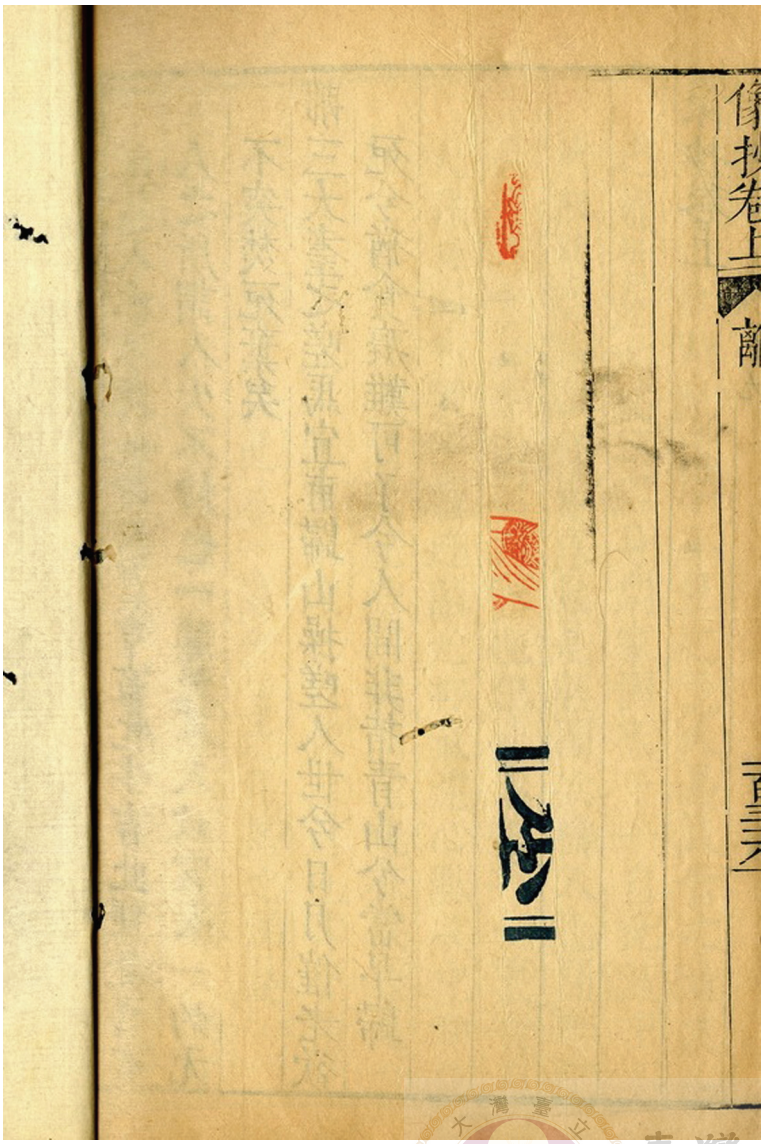
（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藏《通志堂經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影七：《像抄》中夾有「李」字片段的紅、藍色圖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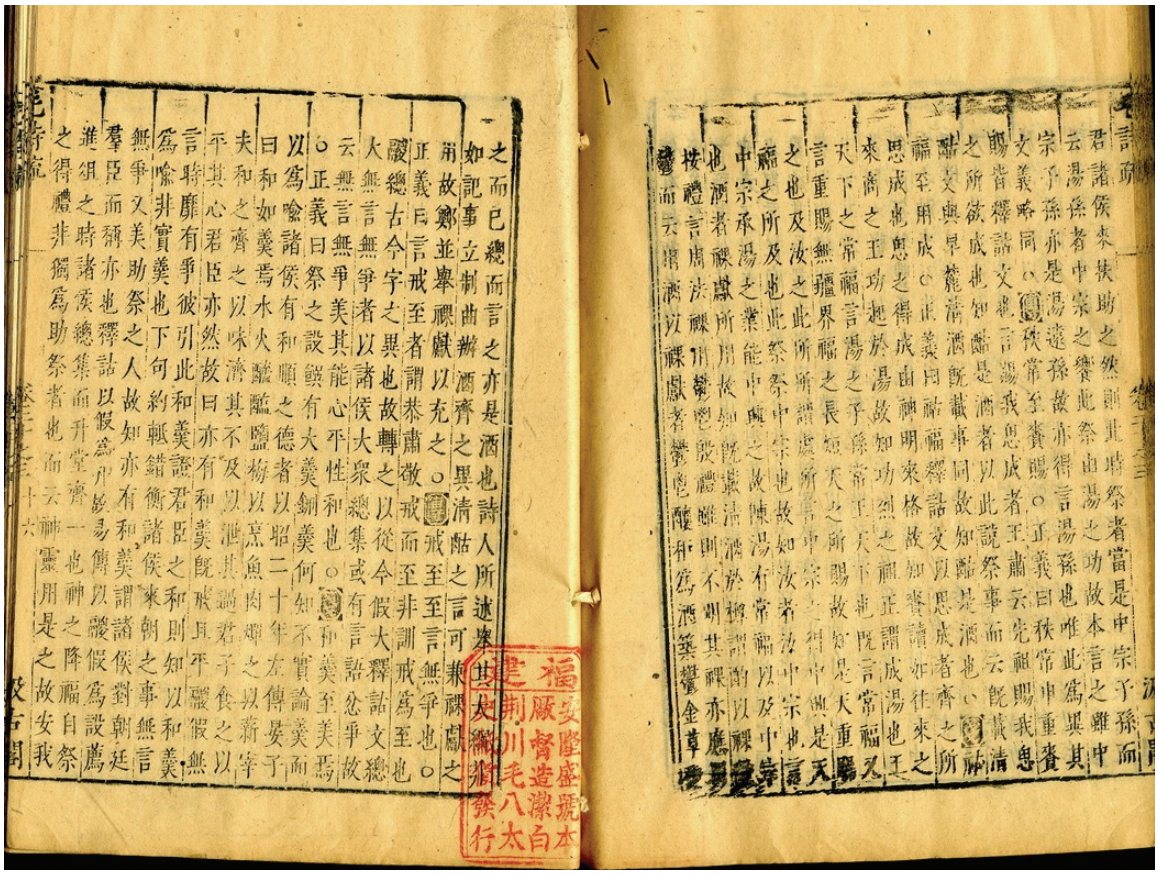
（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像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影八：「福建／安隆盛號本／廠督造潔白／荊川毛八太史紙貨發行」

（來源：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十三經注疏》清重刊汲古閣刻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